

=====

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五七）·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二五期（zk1805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亲历者言】	微人闲话文革	姜国廷
【乱世人生】	北大·三门峡西·达密滩	沈耀才
【往事非烟】	文革秘密准备中（选载之二）	唐荣智
【各抒己见】	放手让全国人民来“反思”文革	王希哲
【一家之言】	我在文革漩涡中（选载之二）	聂元梓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亲历者言】

微人闲话文革

• 姜国廷 •

唐诗有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行宫》）

史上人，世上人，有伟人，有强人，有众人。伟人打江山，称王称霸，治国平天下，建伟业，创历史；伟人能发动文革，惊世骇俗，电光石火，血雨腥风；伟人也能蒙难文革，然后又能成功逆袭，否定文革，第N次演绎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逻辑。强人叱咤风云，轰轰烈烈，或造福一方，或保家卫国，青史留名；众人是水，是空气，是土地，孕育伟人与强人，没有他们，就什么都没有。我是众人中的微人。我在文革中的表现，连花絮都算不上，只能算几片地衣或苔藓。此文是：微人闲话文革。希望能由小见大。

◇ 背景

我很幸运，这个“幸运”有正反两层意思：正面的意思是，我赶在文革前，公元1965年考上了大学，而且还是天之骄子云集的北京大学，陆平校长幽默地叫它“太学”。不管怎么说，我总还算一个北大生，在美丽的未名湖畔混了五十四个月。相比之下，我的高中下一届，被卡在大学门外七、八年，无数比我棒得多的高中生不但进不了北大，连最差的大学也进不了——大学停止招生了整整十一年！反面的意思是，自从我进了北大校门，满以为在求知做学问上可以有所作为，即使不能“立德”“立功”，也要努力“立言”啊。可万万没想到，上课还不到九个月，书生岁月戛然而止，我和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所有读书人一样，被卷进文革大潮。64级及前几级大学生上的课都比我们这一级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65级大学生是人类教育史上最倒运的大学生，可以说空前绝后。

北京大学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诞生的地方，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是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引信。

文革最了不起的地方我以为是它动员的广泛和规模的巨大，最典型、最生动的表现就是天安门广场的八次接见和全国的大串联，其中任何一次都是政治动员的奇葩！“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高领袖发出了伟大号召，于是乎偌大中国放不下一张平稳的书桌，全国停课闹革命！

文革之风吹遍了中华大地，吹动了所有的人，其先遣队和敢死队就是大学生中的红卫兵，北京红卫兵五大造反派领袖中的“大当家”就是北大的聂元梓。可是，不久，同为中央文革爱将的老佛爷和谭厚兰因为教育部“夺权”闹翻，北京的造反派分裂成“天派”和“地派”，北大的红卫兵也分成了两派，两派在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的共同信仰与名义下，刺刀见红。

在武斗之前，好像没有“逍遥派”这个词。文革之初，是“工作组”，而后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是文斗，大家都写大字报。全国规模的大串联也是在1966年9月5日中央的《通知》发表前后开始的。

文革中纯粹的逍遥派并不多，我文革初期也不是逍遥派。我跟所有的大学生一样，从上小学就会唱《东方红》，就知道朱、毛的革命，受的全是党的教育。毛主席是绝对的偶像，是“四个伟大”，是大救星，是神，是佛，是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是胜利的保证，是指路明灯。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我读得滚瓜烂熟，“老三篇”几乎倒背如流。思想上早作好了准备：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就以这样的精神状态，投入了文化大革命。

◇ 当一回造反派

第一次串联到武汉，炮轰湖北省委。时间是1966年8月底到9月初，在武汉半个月左右，同行的还有两位同学。

我参加文革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到武汉串联，动机非常单纯：煽风点火，动员武汉的大学生投入文化大革命。那是很认真的不掺杂私心杂念的举动，全身心投入到“革命行动”中去。住在华中师院（现华中师大）一个多月，连东湖都没有去过。

我和我们班的同学，深入到大学生当中，扎根串连，成功地搞了一场北大文革形势宣讲。主讲者汪鸿燕同学展现了极佳的演讲口才，博得多次热烈掌声，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武汉串联北京大学生联络站把各校揭发湖北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字报汇总，贴到省委大楼，又到长沙印了全开报纸，我们拿到汉阳散发。当时王任重、张体学以及湖北省委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虽然有两报一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文章发表和广播，可老百姓认为他们湖北省委是好的，是革命的，不属于打倒对象，因而对我们的行动很不理解。把我们围在路边七、八个钟头，虽然没有打我们，也没有抢大字报，但就是不让我们贴。

不久，大约是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以后，全国的红卫兵都活动起来了，我们觉得再没有煽风点火的必要了，又觉得免费乘火车的机会难得，就相约到广州、桂林去。这一路就没有任何“革命活动”可言了，纯属游山玩水。文革前上课时没有余钱也舍不得时间旅游，上课九个月，天安门、颐和园只各去过一次；八达岭、十三陵、香山一次也没去。这回可好了，有了时间还免费，痛痛快快玩一次。这是我一生第一次真正的旅游，看了广州越秀

公园的五羊雕塑、桂林的七星岩、芦笛岩、漓江，大开眼界。我们住宿和乘车是免费的，吃饭还都是付费的，借的钱和衣服回北京后都如数退还了。

◇ 一直暗反江青

初次见江青就认定她不是东西。

1966年7月26日江青、康生带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北大赶工作组，在东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我的位置就在主席台前三、五米的地方，台上的一切都看得真真切切。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的面，而且离得这么近。她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恶劣，从话语到动作。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发言控诉工作组，江青又是亲吻又是拥抱。

她讲话了，说：“毛主席没有来。但是同学们每张纸条，每个意见他都看。你们看，我这不是装了一包吗？”

为了证明张承先工作组执行了错误路线，她说：“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特务搞到我家里来了。张少华在不在？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个政治骗子，张少华她自己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她边说边哭。

然后她又点了历史系的郝斌，说郝斌在社教的时候迫害李讷；然后就批工作组，点了张承先、吴振声的名字。她说：“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就是张承先！这4年，我在文艺界工作，受了多少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我心脏也不好了。我也要控诉。”

江青的这些表现让我很反感，我觉得这是一个演员在演戏，很假，而且整人的手段也有小人嫌疑。毛主席日理万机，哪有时间看这些破玩意！在当时社会气氛下，张少华有多大胆子敢撒谎冒充皇太子妃？那不是欺君大罪吗？再说了，就算她妈妈是政治骗子，她女儿就一定是坏人吗？郝斌跟你女儿有过节就证明他是坏人吗？这让我联想起老家一个外号叫“破马老刘”的泼妇，她破马张飞，蛮不讲理，什么话都骂得出口。江青跟她很像。

我这人是个直筒子，心里藏不住话。走出会场的时候，我跟三年级同学王显臣说：“这是一个严肃的会议，怎么能把家里的事情搬出来呢？”王显臣比我成熟，他赶忙挥手制止我，低声告诉我：“这话千万不能再说了，要掉脑袋的！”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轻易跟别人说这些话，但是对江青越来越反感。她以后的每一次讲话，我都能挑出毛病，并且，把我的看法写在日记里。

我这个人还算很幸运，我私下批评江青的事情没人揭发，我也就没遭到政治迫害。可是我的一位高中同班同学卫忠茂却没有我这么幸运。他是吉林财贸学院的学生，在我的宿舍里住了一个多月，我把我对江青的看法对他讲了，他也接受了。他回校后在他的宿舍里传播，他的同学出卖了他。他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起来，蹲了三个月班房。我给他的《林彪文选》等全被没收。办他案子的人问他的同学：“卫忠茂怎么会有这些反动思想？”回答是：“他北大有个同学，他从北大回来就散布这些反动言论。”办案组还派人到我这里查询，我也着实吓得够呛。但是我感谢卫忠茂真够朋友，他没有出卖我。我给来访人写了300多字的材料，说明卫忠茂何时来我这里，何时离开。在我这里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说不定来访人对

卫忠茂抱同情态度，他也没有深究，就走了。可是我的心一直悬着，直到四人帮垮台，我才把心放回肚子里。

后来我问自己：你为什么只见江青一面，就断定她不是东西呢？她可是第一夫人啊！我觉得这不能上纲为所谓政治觉悟，而是一种直觉。我的家族，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善良朴实的农民，他们给我的影响是不能瞪着眼睛说瞎话，不能有害人之心。而江青明显是在说瞎话，明显是在加害于人。一颗正直的心怎么能看得惯呢？

◇ 支持造反派

大约是1967年初秋的一天，系里来了两个农民模样的人，请求支援。他们是西郊一个小小钻井队的工人，队里只有20多个职工，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按规模，连股级都算不上，可是姓王的队长却用公款买了一部北京吉普。这要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就太稀松平常了，还算个什么事吗？可在全民吃大锅饭的计划经济时代，王队长的行为就是特殊化，就是剥削！搞剥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走资派！是走资派就该推翻，就该打倒！可他们那地方虽然也在北京，还是有点山高皇帝远，职工中大部分都是王队长的七大姑八大姨，保皇势力很强，几个造反派动不了那个“走资派”。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到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来求援了。系里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我 and 刘国强。

我和刘国强到钻井队后，工人们觉得有了北大的支援，这个队长怕当不成了，原来那些对王队长有些不满却还在犹豫的工人态度开始转变了，墙倒众人推嘛。我和刘国强深入工人当中，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不到一星期，就把情况摸清了。王队长除了买吉普车，还有分配不公，打骂工人，接受吃请等问题。要在今天，这些问题也没多么严重，充其量算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属于作风问题，批评教育，或给个警告处分就行了。可在当时，那可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上面只鼓动造反，虽然文件上写了要分清敌我矛盾这句话，可在执行中谁去评定矛盾性质啊？别说王队长还真有点问题，即使没什么问题的大中学老师、有功于国的教授、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乃至开国功勋被打倒、斗死的数得过来吗？造反有理，找出问题，管他三七二十一，揪出来斗争就是。我和刘国强帮发言人写好了材料，筹备好了斗争大会。大会召开那天，系里去了一汽车人参加大会，以壮声势。斗争会开得很成功，坚持文斗，没有发生武斗，王队长态度很好，表示诚恳认罪。这次斗争会之后，我们再也没去那里，王队长和他的钻井队后来命运如何，也没有下回分解。

◇ 支持“保皇派”

1967年夏天回老家，听说公社的造反派把公社书记赵杰拉到各大队游街，打个半死，弄到某大队关了起来。

我和赵杰初次见面是在弓棚公社一个生产小队的场院里。那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在榆树第五中学读初中。五中在弓棚镇。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支援农业，中学生也不例外，每年都要到生产队参加农忙劳动。那一天我们班是到一个生产小队帮助打场，在给谷子脱粒的场院里，我看见一个车轴汉子在用木叉子翻弄谷秸，动作娴熟利落。老师告诉我们，他是公社赵书记。

1965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公社大部分村落都没通电，其中就有我的老家莲山大队。第二年夏天，大约也就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的前后吧，家乡传来喜讯：莲山村三个自然村通电了！这可是亘古没有的事！社员们交口称赞刚来不久的公社书记赵杰。

我虽然跟赵书记只是一面之识，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干部。他来我们公社还不到一年，就给我们大队通了电。这样的干部还不是一个给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干部吗？所以，当我听到他被打倒的消息之后，我第一反应是怀疑，造反派凭什么要打倒他？总得有点理由吧？

我把我的怀疑跟当时也在家里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高中同学吕忠义说了，他也觉得这里有问题。我们觉得，“造反有理”也得看造谁的反，走资派的反该造，难道共产党的干部里就没有“走社派”吗？就通通没有好人了吗？我俩达成共识，看看“造反派”打倒他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他们的理由不成立，我们就认定赵杰是个好干部，我们就要“保”他。

我们找了造反派的头头了解情况，头头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赵杰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的家庭出身不是中农，而是富农。我们追问：你们怎么知道他家是富农？他说，我们派人去他家调查过了，还说了几个调查对象，赵杰是富农铁板钉钉，他还劝我们不要插手这件事，首都的大学生可不要当“保皇派”啊。

我和吕忠义觉得，一个人出身无法选择，可是阶级立场是可以选择的。我们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里不是有不少出身地主、资本家的吗？坊间早就流传过周总理智驳赫鲁晓夫的故事。话说周总理访苏期间，赫鲁晓夫不怀好意地问周总理什么出身，周总理毫不掩饰：资本家，赫鲁晓夫自以为得意，马上接口说，我是钳工，工人阶级。周总理立即接茬：你我都背叛了出身的阶级。弄得赫氏自取其辱。于是我俩决定，自费到赵杰老家弄个水落石出。

我俩步行二十多公里，到赵杰老家十五号村调查。我们走访了土改时的村民和农会干部，他们说出了真相。赵家是村里的大户，分好几支，有一百多号人。赵杰的祖上确实有很多土地，但是到他爷爷这辈就分家了。他的叔祖们继续经营土地，家道没有衰落，土改时被划为富农。而赵杰的爷爷消息灵通，知道了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也成立了共产党的消息，卖了地供晚辈人读书。土改时，按赵杰家的土地，划了中农。土改干部金老汉还找出了当时的会议记录给我们看。我们让访问对象都写了证言材料，签了姓名。我们还找了造反派说的几个人，他们说，前些日子确实有人找过他们，他们也是这么说的，也没有写什么证明材料。

回来以后，我们问保赵杰的这一派怎么没去核实赵杰家庭出身问题，他们说，当时保皇派不吃香，造反派势力很大，又都是心狠手辣的人，驻公社解放军代表态度也不明朗，他们没人敢出头。向他们了解造反派反赵杰的原因，他们说，赵杰对干部要求很严，他发现有些干部有参加赌博、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以及借职权之便向下面大队索要生活物资等不正之风，他就很不留情面地批评他们，这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文革风一来，他们以为可以反攻倒算了，但是他们实在找不到赵杰什么把柄，就想做他出身的文章。他们派到赵杰老家去搞材料的人又空手而归，他们很不甘心，于是伪造了证明材料。他们揪斗了赵杰，想把他彻底打倒，打不倒也把他打残，让他丧失工作能力。原来坏人安了坏心，文革给了他们做坏事的机会。我们找到驻公社解放军代表，把材料给他们看了，并说明我们要帮助保赵杰的这一派召开大会，宣布调查结果，解放赵杰，让他出来工作。解放军代表当即表示支持我们。

由于学校有事，我俩没等到保赵杰的大会召开就回北京了。保赵派在大会上宣读了我们的调查结果，会后在驻公社解放军代表支持下，救出了赵杰。不久，赵杰还当选为榆树县革命委员会成员。

◇ 收官逍遥派

“逍遥派”是派战的产物。

在北大还有统一领导的时候，绝大多数人还没被边缘化，起码全系、全校活动还都参加。可是分派以后这个局面就被破坏了。说老实话，至今我也不知道“井冈山”、牛辉林、侯汉清他们另起炉灶的原因。我加入井冈山，动机很模糊，对这个组织和它的头头也没什么特别好感，可能跟讨厌江青一样讨厌聂元梓有关。我跟聂元梓第一次面对面接触是1966年5月25号她贴出大字报的当天。那天哲学系和图书馆系在阶梯教室合开批判“三家村”大会，聂元梓主持。一位茶炉工上台发言，口沫四溅，说：“邓拓，我把你‘拖’出来；还有你——‘泡沫纱’（廖沫沙）！”我当时觉得很好笑，心中暗想：“一个哲学系的讲台，居然允许这么粗俗的发言！这算什么批判啊？”后来聂元梓坐了北大头把交椅，主持会议的时候常读错字，说错话，什么“顿顿的静河，萧霍洛夫写的”；什么“负隅（隅）顽抗”，“辣（棘）手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有人还据此编了打油诗挖苦她。还有她们一个战壕的战友，群体分化、反目成仇等负面消息。使我更加认为：这个人不可靠，不能跟她跑。

1967年8月17日“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宣称要“完成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历史任务”。当时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还起作用，也没预见到后来兄弟阋墙，血肉横飞的武斗，还没产生当逍遥派的念头。于是就糊里糊涂宣布：“自己不是社（新北大公社）里人，而是（井冈）山上人。”实际上，我是个“五没”井冈山人：没介绍人，没写过申请书，没有经谁批准，也没有参加过什么仪式，连一次组织活动也没参加过。

1968年年初，两大派对立组织就火药味浓烈，从高音喇叭的骂战，很快就升级为武斗。3月28日，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将住在里面的井冈山兵团红卫兵赶走。29日凌晨1时，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五个多钟头，相当惨烈。比如双方在窗框上钉上自行车内胎，做成强力弹弓，在地板上铺上厚垫子，用鹅卵石当弹丸，两个人拉一张胶皮条，一松手，弹丸发射出去，人同时后仰在垫子上。据说，这种弹弓杀伤力很大，能射出五、六十米，直径两公分的树枝应声断掉。我们班的沈志福同学被小弹丸击中，上下门牙全打掉了。冯友兰先生的一位女邻居也被“流弹”击中头部，险些丧命。此后，校内火药味越来越浓，双方的大喇叭没日没夜地吵骂不停，让人觉得身处两军对垒的战场，激战随时可能发生。4月26日，交战的双方为争夺36楼，发生了第二次大武斗。战场上箭簇齐发，砖头瓦片满天，木棒、扎枪、长矛在空中飞舞，叫骂声、喊杀声响彻校园。这次武斗双方100多人受伤，大量公共财产被破坏。不赞成武斗，更不想这样去冒死的我，只好逃离。于是我就成了地道的逍遥派，成了共和国首都内的难民。我先后到有高中同学的国际关系学院、首都钢铁学院、北京工一业学院去避乱。那些学校，虽然也都停课，但是没有武斗，吃饭、人身安全都有保证。在那里当难民能干什么呢？打扑克，去昆明湖游泳，去香山、八达岭、十三陵水库。直到八月初北京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两派倒旗，我才结束逍遥派和难民生涯，回到满目疮痍的燕园。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在文革中的经历，只是干了几件不值一提的小事。是也罢，非也罢，不会有谁还记得。北大文革中发生的很多大事我都不知道，更别说其细节和真相了。比较幸运的是，我没参加过对任何同学、老师和领导的斗争，没参加过抄家，没骂过人，没打过人，没参加过武斗，身体和生命都安然地熬过了文革，心理和良心也比较坦然。如果要总结什么人生感悟的话，我就这十七个字：做人，要真，要善，损人利己的事，千万不要干。

◇ 附录 姜国廷2018年1月22日给校友孙兰芝的信

兰芝：

因为我没参加过任何一次两派争楼活动，只在34楼目睹了4·26争夺36楼的武斗，不久就到外校当难民了，直到派斗结束才回校。所以前后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我在井冈山抢占32楼那天，也遭遇了对不起老乡同学的事。我们系64级同学、吉林老乡傅永生是新北大公社成员，他被井冈山赶出，衣物都没拿出来。他让我帮他进楼拿出衣物，我当时虽然宣称自己是井冈山的，但没有参加活动，除了我们系，没人知道我是井冈山的，我又不住在32楼，即使守楼的人让我进去了，往出拿东西也不会被准许，我很为难，就没有帮他的忙。为此，傅永生同学一直觉得我不够意思，一直记恨我。武斗结束后，我总觉得有些愧疚，主动向他示好，可是他一直负气不理我，直到他离校。

宫香政是蓬莱人，我祖上也是蓬莱人，我俩还算半个老乡呢。他出生于1943年，我跟他同龄。当年我若是参加了武斗，在战场上短兵相接，我俩可能还真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呢！

政治弄人啊！我们都被伟人玩了！

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事，都坏在政治家手里，他们在互相“扯犊子”，跟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两韩。

姜国廷 2018年1月22日

（作者简介：姜国廷，1943年生于吉林省榆树县。1965年考入北大图书馆学系，1970年3月离开北大，终生从教，中学高级教师。）

□ 来源：《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王复兴主编，美国南方出版社，2018年

~~~~~

## 【乱世人生】

北大·三门峡西·达密滩

·沈耀才·

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和社会上各单位基本上分为两大派——造反派与保守派。介于其间是态度不明朗的中间派或逍遥派。这两派后来都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

北大由于其特殊性，阵线比较混乱。有一保到底的三保派——保校党委、保工作组、保聂元梓；有两反一保派——反校党委、反工作组、保聂元梓；有三反派——反校党委、反工作组、反聂元梓。我们这一派就属于“三反分子”。反陆平、反张承先工作组时，我们也是支持聂元梓的，但她上台后，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压制、打击异己者，我们便和她分道扬镳了。

聂元梓是反陆平大字报的作者，实际上大字报的真正执笔人是哲学系杨克明。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带头签名，“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桂冠便戴到她的头上了。聂元梓就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树立的一面红旗。

当时，北大陆续成立了一些独立的反聂组织，我参加的是“红联军”。后来，这些组织通过合并，便成立了和保聂的新北大公社相抗衡的井冈山兵团。

1966年10月25日，我们贴出了我起草的大字报《两条路线的大辩论，两种思潮的大搏斗》，署名哲三“恐不乱”战斗队，随后我们便到东北串联去了。

串联回来，这份大字报居然还在，25张纸的空白处写满了“写得好”“坚决支持”的批语，红联军还印了许多份，让外出串联者在全国各地散发。

1966年底和1967年年初，我们这些最初的反聂组织便遭到了聂元梓们的批判、斗争，我那份大字报也难逃厄运。

我在大字报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5月25日，当聂元梓七人贴出那张著名的大字报时，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冲突是多么尖锐！陆平黑帮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是多么深厚！可是，一个星期之后，中央便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一切争端即化解于无形。从当时来看，结论似乎（黑点为笔者现加）早了一点，使北大师生失去了一次锻炼的机会；但从全国来看，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它吹响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冲锋号！这就是局部和整体的辩证统一。7月25—26日晚，中央文革参加北大万人大会，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的辩论又是何等惊心动魄！随后，中央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一切争论又化解于无形。从当时来看，中央决定又似乎（黑点为笔者现加）早了一点，使北大师生再一次失去了锻炼的机会；但从全国来看，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它播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鼓！这又是局部和整体的辩证统一。但聂元梓却忙于拍电影、办展览，为自己树碑立传，把北大的分歧、争论、斗争密封在一池浑水中。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政治上改良主义，思想上实用主义，组织上宗派主义。聂元梓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革命的同路人！历史常常会造成一些情势，把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推上政治舞台，让他们扮演英雄的角色，但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必将还其本来面目。结论：北大必须搅动一潭死水，走清华、地院、北航、北师大之路，来一场两条路线的大辩论，两种思潮的大搏斗，创建名副其实的新北大！”

批判者认为，我这篇大字报的矛头是指向中央的，当时情况下，我也是百口莫辩。不过，批判只是“触及灵魂”，并没有触及皮肉，比起外系、外校的一些过火行动，要文明多了。

那一段时间，北大充满了肃杀之气，沉闷，压抑，我们决定走为上。

我们联系北大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一些同学，又联系了北京医学院的一些战友，决定到河南三门峡西站，和那里的造反派“二七战士”一起战斗。

通过铁道部的关系，我们搞到了免费票，几十人便来到了三门峡西。铁路上的人都知道，三门峡西站比三门峡站还重要。那时都是蒸汽机车，每开几百里就要换车头和驾驶员。不论慢车、快车、特快，都要在三门峡西停。三门峡西有机务段、工务段、电务段，我们分组到各段活动。

河南省的造反派组织叫“二七公社”，三门峡西“二七战友”还为我们搞了宣传车。我们走街串巷，高呼和峡西的战友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甚至年三十还到三门峡市和那里的战友们并肩战斗……



到了1967年春，全国形势就有些不妙，好多造反派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青海军区司令员赵永夫竟下令向青海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开枪，打死一百八十多人。三门峡西的形势也急剧恶化，保守势力乘势反扑，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反动学生，到这里和反动组织“二七公社”“勾结在一起，捣乱在一起”，必须接受革命群众批判。

他们对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女同学傅华特别恼火。她是广播车上的广播员，能干、泼辣、风风火火。游行时，我们也随车行动，遇到对方阻拦或冲突时，我们随时写成文字，或抗议、或声明、或辟谣，交傅华广播。在对立派反攻倒算时，他们贴标语、画漫画，坚决要把“小妖精”傅华揪出来斗倒批臭。

峡西铁路上的战友决定助傅华出逃。他们让她女扮男装，化装成司机，悄悄上了“专列”，西下潼关。这“专列”，只是个火车头而已。傅华经风陵渡过黄河，安抵山西，直奔北京。

对立面获知傅华神秘失踪，暴跳如雷，对我们严加看管。一日下午，他们将我们送到农村。一到那里，便被农民分割包围起来。当地铁路上的人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反动学生，到这里来造反捣乱，现交由贫下中农批斗。贫下中农便吵吵嚷嚷、东推西搯地对我们批斗起来，我们也无法辩解，只得任由他们折腾。直到傍晚，贫下中农宣布，你们明天还到这里来，不要回去了，和四类分子一起，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监督。

回到峡西住地，对立面便将我们不分男女关到一间大房子里，门上了锁，外面水泥柱上亮着强光灯。大家七嘴八舌，说交给贫下中农那就完了，我们在他们眼中是坏人，怎么整都可以，何时出头？干脆分开跑吧，各谋出路。

我们从窗户上跳出去，车站都被他们控制了，上不了火车，只好化整为零，四下逃窜。我和几个同学在铁路旁高一脚低一脚地往西走。天亮了，我们已走了几十里，过了好几站，估计已冲出对立面的势力范围，这才敢买票上车。到了风陵渡，我们急忙下车，先躲到铁路桥梁下，看看动静。果然，有一个火车头开过来，显然是追我们的。我们连呼：“好险哪！”

过了黄河，到了山西地界，我们再无后顾之忧了，便急切地奔向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

后来，北大由“文攻”发展到“武卫”，直到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内斗才结束。同时，我们也被“扫地出门”。

1968年12月，我响应毛泽东向大中学生发出的“面向基层、面向厂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的号召，告别未名湖，走出燕园，奔赴青海，接受解放军“再教育”。我们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中央财经学院等数十所高校的200余人，被安排到驻防在离西宁二、三十里的大堡子公社的8064部队“锻炼”。这个部队是汽车运输团，专门从西宁运物资到拉萨。

我们分为两个连，我在二连，全部是男生，又称“和尚连”，一连为男女生混合连。

刚到部队不久，就出了一件惊天大事：在女厕所发现“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部队便在女生中暗查，并让每人抄写一段文字上交，意在核对笔迹。此后便无声无息，仿佛把这件事忘了。

1969年春节一过，真正的“锻炼”开始了，我们戏称为“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我们被送到离西宁近千里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曲什安乡达密滩部队所属农场。达密滩为藏语，即鬼滩之意。

我们没有房子住，只能住地窝子。地窝子就是在地下挖个坑，再弄几个台阶供出入。地窝子上部有一根不粗的竖梁，再横搭几根木棍，堆上树枝、杂草，上覆泥土。一个地窝子住一个班，土炕左右分开，中间有通道。每人炕头墙上掏个方洞，用作放蜡烛或煤油灯。

这里生活、交通极为不便，团部一般十天左右来一趟车，带来连部和同学们所需物品及信件。因第二天车就要回西宁，大家便连夜复信捎回。即便来了电报，也只能待在西宁团部睡大觉，等下一次来车。

理发要互相帮助，有的怕麻烦，干脆剃了光头。这里是无法洗澡的，因是黄河上游高原地带，即便是夏天，水温也只有十几度，勇敢者只能在河边用湿毛巾在身上擦一擦。长虱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满脸横肉的张副团长“教导”我们说，这是“革命虫”，表明教育改造有成果。

一天夜里，大家正在睡梦中，四班一个同学外出上厕所，还未回来，地窝子上那根不太粗的竖梁便塌了下来，幸好砸在中间通道上，未造成事故。大家惊魂未定，纷纷要求连里向团部反映，用粗木头当梁，提高安全度。团部指示，让我们在黄河里捞木头。黄河里怎么会有木头？原来这里交通不便，黄河上游果洛林场每到夏季便将好多木头投放黄河，顺流而下，在下游某个集中点再打捞上岸。

这天，我们班及其他班因加了夜班，都在睡觉，捞木头的任务便落在了七班身上。七班班长曹万芝是个非常好的山东汉子，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早已结婚，并有两个孩子。他说自己游泳很棒，曾横渡过黄河。别的同学还在岸边做准备活动，他就跃入冰冷的河水中，并抱住一根木头，拼命往岸边划。黄河水流比较急，还有漩涡，他折腾半天也划不到岸边，自己反而精疲力竭。他决定放弃木头上岸，谁知一个漩涡把他卷入河底，再也没有冒出来。各班轮流到下游守候，祈望能找到他的尸体。整整一个星期，一无所获，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有一种压抑已久而无法发泄的情绪在蔓延。我们强烈要求连里和团部向上申报曹万芝为烈士。团里也这样做了，但省上没有批准，认为曹万芝虽然表现很好，但捞木头并没有经过林场和有关部门的批准，是为了小集体而损害国家的利益。这使我们懊恼万分。

这期间，还把一连的女班长陈明萱叫回西宁。陈明萱毕业于北大地球物理系，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锻炼时能吃苦，脏活累活抢着干，大冷天搬石头手上都裂出了口子。几个月后，陈明萱突然被押到农场进行批斗，说西宁团部女厕所的反动标语是她写的，她是现行反革命。原来，陈明萱回到西宁后，即被隔离审查，青海省军区、兰州军区都来了人。他们说经鉴定笔迹，女厕所反革命标语就是陈明萱写的，但陈明萱拒不承认。谁知部队也大搞逼、供、信，把陈明萱折磨得半死不活，还引诱她说：只要承认了，就宽大处理。陈明萱看不承认过不了关，又轻信了他们的承诺，左右为难中便承认了。承认后又反悔，认为自己不坚定，经不起残酷环境下的考验，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推翻了先前的“坦白”。有关部门认为她出尔反尔，态度恶劣，硬是把反革命标语案定在了她的头上。

批斗会上，陈明萱被绑成“喷气式”，批判者同仇敌忾，口诛笔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反革命分子陈明萱”、“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陆君安是她的同班同学，又是她的恋人，也不得不跟着举拳头，喊口号。会后，在各班的讨论会上，我们和陈明萱熟悉的同学，都纷纷谈认识，作检查，说什么阶级斗争观念薄弱，政治嗅觉迟钝，反革命分子就在身边，却认为她表现很优秀。但私下，我们北大几个要好的同学，还是不大相信她会是反革命。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西宁大街小巷贴满了布告，“现行反革命分子”陈明萱赫然在列。她被判八年有期徒刑，在青海省劳改局下属服装厂劳动改造。她表现良好，虽有上诉，均石沉大海。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陈明萱又写了申诉材料。经西安、北京、沈阳笔迹专家鉴定，陈明萱的笔迹与女厕所“反革命标语”有相似之处，但并非她所写。平反通知下来，陈明萱已劳改了五年。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后，她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研究所研究生，后移居美国。

女厕所那个“反革命标语”原来是部队来自陕西农村的一名汽车兵写的。此案的侦破方向被他引入歧途（因标语是在女厕所发现的），居然好几年都安然无事，他不禁自鸣得意起来，在从西宁开往拉萨的汽车上，沿途他又多次散发“打倒毛主席”的传单，最终暴露……

文革初期，我是一个虔诚的拥毛派。当时全国各地两派，不管斗争如何激烈，甚至发展到武斗，动枪动炮，但两派的一致口号仍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毛泽东思想，且“万岁”不离口。两派都在争做效忠的臣民。

从批判“两个凡是”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我们从文革的造神运动中逐渐走了出来。但中国人思想上历史因袭的东西太多，在一定条件下，仍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文革思潮和新的造神运动的鼓噪者。

我们只有克服良民、臣民的自我矮化心理，牢固确立公民意识，普世价值，宪政理念，那时才真正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作者简介：沈耀才，1963年考入北大哲学系。〕

□ 来源：《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王复兴主编，美国南方出版社，2018年

~~~~~

【往事非烟】

文革秘密准备中——华东局宣传部若干史事记实（选载之二）

• 唐荣智 •

◇ 夏征农其人其事（摘自第一章“大写十三年”）

夏征农（1904·1·31—2008·10·24）原名正和，笔名征农。祖籍江西省新建县（现属丰城县）。据本人自称，（注三）出身于地主家庭。中学时期，对什么都看不惯，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有孤芳自赏的才子习气。历经“五四”、“二七”、“五卅”革命风暴，开始懂得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道理，参加革命，1926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时加入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在县里工作，大革命失败，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做团支

书，坐了二年牢。1931年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1931后，曾因病脱离了党的关系。1933年二次写信没有接上关系，参加左联搞文化工作。1937年才恢复关系。”1938年从南昌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历经皖南事变。历任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苏中四地委宣传部长、苏中公学校长、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建国后，历任山东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济南市委第四书记（主持日常工作）。1958年因“严重右倾”被免职，下放到一个公社党委任书记。1960年纠正舒同错误后平反。在从济南市委调华东局工作期间，针对山东党组织的问题，写了《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一书，说出了他对党的生活的重大原则问题的看法，批评了党内民主、党内斗争不正常和领导作风“大呼隆”，“急急风”，“头发胡子一把抓”，“一天革二十四个命”，“上级指示不过夜”等等。这时候他调到华东局，开始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兼任部长，后来石西民升任上海市委文教书记，他任部长，以纠偏姿态，准备有所作为。那时候他近60岁，在部里领导中他最年长，资格也最老，级别最高（行政八级），很有主见，总有出人不意的主张，但是他一口江西土话，开会讲话听懂，写下文字有思想性和新意。

第七章 夏征农免职

1965年9月13日，宣传部由吴建副部长带队，组织部分干部去浙江？平湖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习，文艺处内蒋文杰和我作为队员，并于10月11日进入该县城？公社。与我俩同行的还有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沈浮（名导演）、孙道临、孙景璐、胡承毅、王大光等，承担同安大队的社教任务。这个大队半年内完成任务后，我又转去黄山公社石桥大队负责社教。我们正从机关搞戏剧革命出来，与电影界人士当然很谈得拢。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当时农村社教运动是根据中央1966年1月14日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进行的，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我们在学习《二十三条》中最不清楚的是其中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一个新名词，什么是当权派？哪一级干部算当权派？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中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文艺界中是否也是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到我们十个月后离开农村社教，始终没有弄明白，上级也不作解释。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公开发动全国进行文化大革命，是下达到县团级的，我们在下面没有参加学习。至7月23日，机关来通知回部里参加文化大革命，我才离开黄山公社。

一、三十年代文艺“黑线”

回到机关，就参加部里大会，听中共中央文件宣读（大意）：因为夏征农在华东局宣传部执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联系到他在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问题，免去夏征农的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职务，任命张春桥为华东局宣传部长。对中央突然直接下达这个文件，我们部里同志都没有预料。而且我是三十年代出生的，第一次听到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说法，即使部里老干部，那时不在文艺战线上工作的，也不清楚这个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指什么，夏征农在三十年代文艺战线上到底又做什么。

接着，张春桥到部上任，开了一个全部干部大会。他介绍了中央还派杨恺（原南京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任宣传部副部长，迟鹏（原高炮师政委）任宣传处副处长，以加强宣传部领导。他自称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他身兼三职：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文教书记，还是以上海市委的工作为主。同时，他要求部里干部投入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央文件揭发批判夏征农的问题。此后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张春桥再未来

到部里与大家见面。宣传部运动就此开始，首先矛头都对准夏征农，机关业务工作全部停顿，成立宣传部机关文革小组组织运动，以写小字报，抄成大字报，揭发批判夏征农。

其实，在《五·一六通知》中，中央已经指出：“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按照这个文件精神，夏征农是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当然应该“清洗”下台了。因为“这是异常危险的”，因此中央在华东局第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下文件“清洗”他。到“一月革命”后，部里的夏征农专案组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管理，指派专案组人员赴京到中央查看夏征农免职的文件原来档案，看到签发此文件赫然写着周恩来，回来向全体部里造反队员传达了。

至于三十年代文艺“黑线”，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指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那么，夏征农与“所谓三十年代文艺”有什么历史关系呢？

据他写的《我的检查》（1966年6月30日）中提到：“1931年后，曾因病脱离了党的关系，33年二次写信没接上关系，参加左联搞文化工作。”“同艾思奇同志等一道编过《申报》、《读书问答》、《读书生活》、《新知识》等期刊，还协助陈望道编过《太白》，当时写过很少文章，同左联不是很深关系。周扬是认识的，田汉、夏衍不认识。对当时党的文艺领导是机会主义，没有那个觉悟，只知道党的领导，有些斗争参加一下，表示一下态度。”“1936年我刚从桂林回来，对于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周扬等同志要我发表意见，在我的文章中，虽然在解释上与周扬同志有所不同，但我赞成了这个口号，也就是说，投了投降主义一票。这就表明我当时的阶级立场是模糊的。在《纪要》前是没有认识的。我没有反对过鲁迅，国防文学是接受了郭沫若的看法。”据查，当时夏征农的文章中认为：“我们应该更公平地号召：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如果说得具体点，在不妨害统一战线的发展上，谁的工作努力，谁能更有效地使工作推进，谁就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谁也可以发生领导的作用。”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据夏衍记述（注十七）：

“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1936年2月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是在同年6月1日由胡风在《文学丛报》上提出来的。对这件事，茅盾在《回忆录（十九）》中有以下一段话：‘鲁迅说，胡风自告奋勇着要写，我就说，你可以试试看，可是他写好以后不给我看就这样登出来？。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对那个口号的解释也不完全，不过文章既已发表，我看也就算了。’

“这是一段比较客观的记述，我相信是符合实际的。”

“茅盾说的冯雪峰也有点着急了，这是事实，因为胡风的文章中并没有说这个新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所以赞成国防文学的人纷纷起来反对这个口号。从6月上旬起，形成了一场剧烈的两个口号的论争。由于论争口号是一边倒的，赞成新口号的文章不多，加上国民党小报又大肆进行幸灾乐祸的宣传。”

“我再一次问他对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的意见，他（指冯雪峰）说中央没有交给这个任务。”

“最近我看到云远的《东京初访郭老》中记载：‘郭沫若表示：用国防两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吧。因为对国这个字有所犹豫，国是蒋介石统治着的。不久，送来了《八一宣言》，仔细读后经过几天的思考，体会到宣言的中心思想，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国是被帝国主义欺侮侵略的国，这才接受了国防文学这一口号。’”

“从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明，提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总的来说是从《八一宣言》中的国防会议、国防政府得到启发的。”

“经过《二十一人联合宣言》，到了九月底，两个口号的论争基本上已经停了下来。”

这就是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背景，鲁迅当时曾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是无产阶级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

二、为什么不能当部长

2013年，本人为了准备接受口述历史的采访，向原宣传部理论处同事徐阳通电话询问，他说他不知道俞铭璜部长组织写十篇文章事，但是他告诉我们以往都不知道的一件事：

“2004年夏征农一百岁时，原华东局宣传部的人为夏老作寿（作者注：本人没有参加）。本来以为夏老不会来的，考虑他一百岁了，跑不动了，哎，他来啦。来了以后，大家坐下来，主持会议的人没讲，夏老自己先讲。他说因为今天都是宣传部的人嘛，我不怪大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打倒我。我告诉你们，1965年杭州会议时，毛主席讲，夏征农不适合做宣传部长。这个话从来没有透露过。毛主席讲夏征农不能当宣传部长，你还当得了？！后来，魏文伯书记见到夏征农，说主席讲，你不能当宣传部长了，你是不是就不当了？你就来当华东局副局长吧。夏老说，我不干，我为什么不能当宣传部长啊，主席也没有讲我有什么问题啊。夏老这个人很硬啊，当时没有下台。”

是啊！毛主席并没有讲为什么夏征农不能当宣传部长长的原因。为什么毛主席在1965年讲这件事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要夏征农下台呢？《五·一六通知》已经讲清楚了：对于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你看，毛主席派江青到华东局做秘密准备文化革命，夏征农是什么态度？概括地说：

江青要夏征农配合抓京剧，夏征农却话剧、戏曲、京剧一起抓，来个三者并举。

江青要夏征农配合抓样板，夏征农却抓半成品，普及与提高结合，普及第一。

江青主张京剧中强调唱，夏征农却要唱念做打。

现在来看，夏征农自己回顾对江青抓京剧革命的情绪和态度：

“对京剧革命，我思想上有折中主义。它是古老剧种，有国际意义，重要是重要，但认为少，同时也想到京剧是碉堡，难攻。”“对江青同志，开始我就说难办。她要求比较严，我有点受不了。另外，自己没有信心，革命干劲没有，许多错综复杂原因在一起，就发泄在普及提高上。曾背后说：一两年抓一两个戏，能占领舞台吗？我对洪泽同志讲，洪泽说：你这个人太老实了，汇报这些东西（指不满情绪），现在只能听她的。江青主张唱，我和洪泽一样，认为唱念做打都要，洪泽也不主张老是唱唱，要唱死人。我和江青疏远，这也是一个原因。”

江青碰到夏征农这种情绪和态度，向陈丕显、魏文伯反映过，说夏征农信心不高。陈丕显还在江青面前讲夏征农的好话。可见，江青会向毛主席报告夏征农的事情。1965年杭州会议上毛主席提到夏征农不适合当宣传部部长就会是这个来由了。

在江青看来，她奉毛主席之命，到华东局这个基地，秘密准备文革，推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夏征农不配合，一路上设软钉子，当然属于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夏征农为什么不能当宣传部部长的原因，不是很清楚了吗？按照《五·一六通知》：“清洗”！

《五·一六通知》公布，文革秘密准备结束。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风骤雨席卷而来。

本书结语：所谓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有秘密准备四年。

华东局基地面目真相，就在本书显现。

2018年2月12日

注解：

三，《我的检查》，夏征农写，1966年6月30日
十七，夏衍：《懒寻旧梦录》，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第221—248页

□ 摘自唐荣智：《文革秘密准备中——华东局宣传部若干史事记实》

~~~~~

【各抒己见】

放手让全国人民来“反思”文革

• 王希哲 •

“反思文革”“反思文革”……几十年右派天天喊。最近，他们的同盟军马晓力们因一台《大海航行靠舵手》上书中共中央，要“严查”“追究”文革翻案，还问，“反思文革你准备好了吗？”

早准备好了！请中共中央放手让全国人民来“反思”文革，以纪念文革五十周年。

反思文革，首先有个立场。明白了立场，才有反思的标准。

以中共那个否定文革的《决议》立场？凭什么？

为什么不能根据中共开展文革的《516通知》和《十六条》立场？

你是反共的，两个决议都不是凭，你是拥共的，凭什么只能拥邓小平的决议，不能拥毛泽东的决议？

我认为，反思文革，不必党的立场，只有一个立场，人民立场，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

据此，我们以三个层次来反思文革：

- 一， 文革的宗旨和总目标正确吗？
- 二，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责任；
- 三， 文革中发生的坏事都是文革吗？究竟是谁干下的坏事？

◇ 第一层反思：文革的宗旨和总目标正确吗？

文革的宗旨和目标，是反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整党内那些主张或实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才是文革，没有别的“文革”。文革中发生的所有偏离这个宗旨和目标的一切，都不是文革本身，它是文革中卷入的各方理解和利用文革衍生的问题（如“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徐水良们干的事情等）。

那么，反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不允许将中国劳动人民重新置于资本的深重压迫盘剥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个宗旨不对吗？不符合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吗？

看看今日中国劳动民众深重苦难的现状吧，我们该怎样“反思”文革？熊蕾女士驳马晓力说，“文革可怕，难道欺压工农大众的资本不可怕？”。这，就是站在人民立场对文革的反思。反思很到位。

其实，只要看今天的贪官们，资本权贵“猫二代”们都一色地骂文革，神经质地怕文革，抹黑文革，就已可知文革是不应“彻底否定”的了。

这是第一层的文革反思，是最根本的反思。

◇ 第二层反思，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责任

文革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领导下，几乎全面地整了那样多的老、中级干部，打了许多的“走资派”，错了吗？

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如果后来的实践证明，文革整的那样多的“走资派”，以邓小平为首（刘少奇死了不算），毛泽东死后，竟全都坚持着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证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错了，真的大错了。但邓小平们不是，他们否定了文革，却一窝蜂向最坏的资本主义无节制“改开”，越来越深也不愿回头地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了，甚至本人及家族都已成为了富甲天下权贵买办大资产者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冤枉他们了吗？整错了吗？没有呀！你们牢骚什么？控诉什么？有整错的没有？也就是当初被打“走资派”，后来证明坚持了社会主义立场的，有吗？有，真不多。但毛泽东中央文革一点没错？也不是，起码，他们不应该将所谓“走资派”老干部当敌我矛盾，破坏了法制，动不动将人“打倒”，关押。这点，老王早在文革中就“反思”了，向毛泽东中央文革直接提出了批评，要求“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 第三层的反思，这最刺激神经：文革中发生的坏事都是文革吗？究竟是谁干下的坏事？



文革中的确发生了大面积的阴暗面事件。右派“反思”文革，最唠叨不休的，就是这些了。但他们能够证明，这些文革期间发生的阴暗面事件，是文革“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基本路线下的必然产物吗？不是。

我们看“改开”。放任的资本主义化“改开”路线，有它的必然的社会产物：千百万工人下岗失业，千百万妇女卖淫求生，千百万流离失所的农民工挣扎城市边缘贫民窟，被欠薪，被跳楼，被抓捕，被打死踩在脚下，千百万弱势民众家居被强拆，学生老师相互奸杀斗殴，医生患者相互报复仇杀，从中央到地方“无官不贪”，城乡恶霸黑社会横行，亿万人民天天吸毒气，喝毒水，服毒药，吃毒米，炒毒油，餐毒肉（很快，就要有毒盐上市了！）……。这些，是“改开”中偶发的问题吗？不是，它是放任资本主义化和私有化“改开”的必然。无论你如何的“严打”“严查”，只要这样的“改开”路线不改变，这一切的黑暗，就将随波逐浪无可阻挡地汹涌发生直至冲垮你的最后防线。

而文革中发生的那些阴暗面事件，我们假设“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群众运动再来，算第二次文革吧，那些右派三句不离口的“毁坏文物”，“斗杀地富反坏”……还将必然地一定地再发生吗？不会了，起码绝不会大面积发生了。它们之间没有必然性。说明什么？说明右派口口声声“反思”的文革，根本就不是文革，恰是文革中某些势力企图挑起混战乱斗，转移文革“整走资派”基本路线的方向。

右派“反思”控诉文革“反人性”“反人类”还有一件最著名罪状，就是“学生打死老师”。老王已经证明，不是什么“学生打老师”，而是“师生打黑帮”。但，即便是所谓“黑帮”，就可以疯狂乱打，就可以将人打死么？这真是“反人性”“反人类”的！但这文革中发生的“反人性”“反人类”的骇人事件，谁干的？现在，冤有头，债有主了，宋彬彬、陈小鲁、马晓力们出来“反思”，承认了正是他（她）们干的！（据说还有个邓榕，尚未听她“反思”）。

问马晓力们，你们干的，就是文革干的么？文革要你们去打死人了？毛泽东中央文革要你们去打死人了？！相反，不正是毛泽东怒斥你们的老子“实行白色恐怖”，“将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么？你们自家文革中干了“反人性”“反人类”的“纳粹，法西斯”罪恶坏事，你们自己认罪便是，向苦家赔偿就是，凭什么栽赃文革，将包括我老王在内的当年数百万千万红卫兵都拉来陪绑“反思”，好像这百万千万红卫兵都“反人性”“反人类”了？好像这百万千万红卫兵都像你们一样地随意打死人了？！

宋彬彬、陈小鲁、马晓力们“反思”文革，将自己文革中的妖魔行为来妖魔化他们敌视的文革，真的是良心发现，忽然同情当年被他们打死的“老师”“地富反坏”了？猫哭耗子。戳穿了，不过是害怕经历了文革“演习”的中国人民再站起来声讨打倒和清算今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罢了。

把假眼泪抹去吧。诗曰：“啜其泣兮，何嗟及兮”。反思、控诉文革的右派们，你们看见了，你们近半世纪呱躁不休血泪哭诉的文革中“反人性”“反人类”的“学生打死老师”的凶手，正是你们现在的反文革同盟军呀，正是那些邓路线“改开”下的“猫二代”资本化权贵呀。你们找他（她）们算账去！

一定要反思文革！一定要反思文革！

左中右派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全国人民放手地来“反思”文革，以纪念文革五十周年。

2016年5月9日

□ 来源：《批判与再造》，2016年5月

~~~~~

【一家之言】

我在文革漩涡中（选载之二）

• 聂元梓 •

第四章 校文革成立

◇ 江青的家宴

十一中全会上，在毛主席接见我、杨克明、张恩慈三人之后，在一次小组会上江青悄悄地对我说，她要请我到她家里去吃晚饭。当时，我还以为她是和毛主席生活在一起呢，我又可以见到毛主席了。会议结束以后，我就跟她一起坐上她的车子走。没有想到，她是把我接到了钓鱼台，而不是中南海，那时候她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的成员当时都住在那里。

吃饭的时候，江青对我说，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很尖锐；过去，毛主席的指示谁也不听，北京市委彭真不听，邓小平也不听。现在呢，刘少奇把阶级斗争都搞到我们家里来了，说刘少奇派办公厅的安窃听器，派服务员监视我和毛主席的行动，我和毛主席在家里都不能随便谈话，怕被窃听呀。江青还说，她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也发表不了，她要写东西，要改剧本，搞样板戏等等，也处处受到限制。甚至她外出，比如，去上海或其他地方休养，还有人跟踪。她还说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二人生活很奢侈浪费，房子要住最好的，而且要比她和毛主席的房子都多得多；出国访问的时候那么铺张，穿的那么漂亮，衣服换了又换。她自己呢，生活俭朴，衣服也很少，身上一点儿钱都不装。她还对我说：“明天你会听到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当时毛主席的大字报还没有出来。江青攻击刘少奇和王光美等人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江青对我讲这些话，显然是有用意的。她说，我们写的那张大字报，是她自己亲自送给毛主席看的。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住在杭州，她自己去送大字报，非常危险，这时，还有人跟踪，是刘少奇的人呀。还说，刘少奇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而且主席已经退二线，他放手的工作，他都还拉个人势力，搞得实在不像话。主席不能再忍下去了，原来刘少奇历史是有问题，很严重，以后你会详细知道的，还说王光美是资本家的女儿。我说，那怎么过去没有出现呢？在延安整风还学习他写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呢。江青说，那时形势造成的。现在主席不能再原谅了。你很快也就是明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讲话，你就会知道关于刘少奇的一些问题，暗示会议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最后她还对我说，以后我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她，她随时可以接见我，等等。

江青这样讲，意图很明显的。她告诉我大字报是她亲自送的，为此我应该感激。而且，她还特意表示对我的关照和信任，要把我拉到她这一条线上。她请我吃饭是在八月四日晚上，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是八月五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布的。江青提前向我透露有关情况，很明显地，她是在拉拢我，是“恩宠有加”，是表明她把我当成了她的嫡系和心腹，才对我透露最高机密。可是，我对她讲的这些事情都没有明确说什么，也没有对她表示感谢，更没有“受宠若惊”。我只是说，首长和我谈话谈得时间很长了，应该休息了。于是，我就告辞了。

关于江青请我吃饭，和我谈话的事，回校后，我只对孙蓬一讲过一点，没有对其他任何人说起过。她讲刘少奇、彭真、邓小平及王光美的那些坏话，我也不认为都是确实的。就是在批判刘少奇的高潮中，我也没有向别人透露过江青说他们的那些坏话。因为我对上层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我不敢随便说些什么。

◇ 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主席指示要北大的革命师生列席会议。于是，我和杨克明、张恩慈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了我们三人，康生、曹轶欧参加了接见。毛主席问我是哪里人，问了我的经历什么的，他表扬我们的大字报写得很好。毛主席还指示说，北大应该成立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的组织，要我负责成立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工作。以后并用巴黎公社选举的方法产生北大校文化革命委员会。

八月五日，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突然拿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说是“大字报”，其实是印成文件的形式，发给参加会议者。这篇文章在一个新的高度上，评价了我们的大字报，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并且将其作为向刘少奇开火的一颗炮弹。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泽东主席公开讲明了党内有两个司令部，而且要带头炮打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到底刘少奇都搞了些什么，我也不清楚，光知道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那我们就得打倒刘少奇了。我不知道刘少奇到底有什么问题，应不应该打倒，可是毛主席这张大字报一公布，我们的大字报也就成为打倒刘少奇的炮弹了。后来给刘少奇扣的那几顶帽子，“叛徒、工贼、内奸”，我是感到非常困惑的：要说相信吧，这么严重的问题，隐瞒了这么多年，到底是什么人给他作掩护？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毛主席过去就一点儿都不知道？要说不相信，这都是毛主席亲自给他定的案，毛主席是不会看错人的。想来想去，还是要相信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给他做了结论嘛。不过，对于刘少奇，我一直没有多讲过什么，就是按照党中央的口径，重复中央文件和报纸上的提法，没有做过任何超出中央文件的批判。即使是江青对我示意和当面讲了刘少奇、王光美的许多坏话，我都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江青的话，更没有拿江青的话去揭发批判刘少奇；即使是在中共九大会议上，那么多人发言揭发批判刘少奇，我也没有把江青说给我的关于刘少奇的那么多坏话对任何人透露过一句。

我赞成打倒刘少奇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一九六七年七月间，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在中南海外面安营扎寨，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到造反派中间接受批斗。北大组织学生参加了“揪刘火线”，我还亲自到中南海外边去看望了参加“揪刘火线”的学生，以表示鼓励。显然这都是错误的。

.....

◇ 毛主席说，北大是“池深王八多”

“文革”中的怪事多，其中之一就是，在攻击诋毁他人的语言上有许多“发明创造”。

北大历史系那时候出了一幅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是讲北大的“牛鬼蛇神”多。过去总是说北京大学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有很多国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现在是把褒贬都颠倒过来了。这对联不知道怎么经李讷传到毛主席耳朵里去了，毛主席说，要改一个字，北大是“池深王八多”。毛主席的话，是他女儿李讷当面告诉我的。池浅也好，池深也好，这些都是针对着教授们讲的。

毛主席这样讲了，我怎么办？出来进去的，碰到这些教授，我该说什么？原先我在经济系，一个教授一个教授地到家里去看望，现在我见了他们怎么办？特别是有一位经济系的教授，一向响应党的号召，他也跟着年轻的红卫兵起来“闹革命”。他老是追着我屁股后面，追到我家里去，问我这问我那的，要我告诉他该怎么“革命”。我跟他说，你别找我，你走吧。他不理解我，他觉得我过去对他那么尊重，老上他家里去，关心他，连他姑娘闹离婚的事情都对我讲。这样的家庭纠纷他都对我讲，让我帮他出主意，现在我怎么就不愿意理睬他呢？其实，我能对他说什么？我说你别跟着学生们乱斗？我不能说。我不能对任何人或者是有关运动的事情随便表态。我也不能表态说谁谁谁是或者不是牛鬼蛇神，或者谁谁谁是或者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你应该去斗争他或者保护他，我也不能说。在校园里，见了以前认识的老教授，我都是一句话不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要是别的学校的人，你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我可能会相信，北大的这些教授，大部分我都是有些了解的，有的人我都到他们家里去过，谈过话。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怎么能说他们是反动的？真是不好办！

我没有办法放陆平出来。把陆平关起来是工作组关的，工作组撤离学校，各项工作都向我们交接，只有关押陆平的事没有交待。看管陆平的学生们没有人领导了，就找我，我说管不了。多次找我，我坚决拒绝了。因为陆平是党中央管辖的干部，给他政治上定性为“黑帮”、“反党分子”等，这是党中央决定的，他到底政治上有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我们只对他在学校领导工作有意见。工作组把陆平关起来，也是请示了上级的，工作组走了，我既不能接管，也不好放他啊。但学生们不理解，一定要我接管，有时走在校内路上，碰到我，不管我听不听，就罗哩罗嗦地给我说一些，什么陆平和他爱人怎么通话啦，他爱人给他送烟，怎么往烟盒里夹纸条啦。我听着也不吭声，夹纸条就夹吧，人家夫妻俩见不上面，写个纸条子还不行？陆平被关起来，他的家也从原先住的地方搬出来了。保卫组负责人谢甲林还陪我到陆平新搬的家去，看了他的爱人和孩子，询问有什么困难没有。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办，我不能多说什么，多做什么。

可是，在更多的场合，那时候的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了。那些老教授，本来都很熟悉，过去对他们很关心，现在见了面，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关心的话不能说，“原则”的话，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话说不出口，只好绷着脸，一言不发。就是有一个机会，我马上抓住了：毛主席说，要保护好几个重点的学术权威，包括翦伯赞，周培源，等等。这下好了，我们和谢甲林就派了保卫人员，派了学生，轮流在翦伯赞家里值班。翦伯赞在校外住，要是不派人看着，让别人揪走了，我们也不知道。校文革保卫组谢甲林就派人保护他，还规定谁也不准乱斗，谁要斗他，必须经过校文革批准。周培源也是这样。再就是给他们提供生活上的方便，他们几个人看病要车，随时要，随时派。翦伯赞夫人当时特别感动，说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照顾他们，现在不批斗翦伯赞了，生活也自由了，要车也很方便。这都是我和校文革保卫组谢甲林亲自安排的，车队也是我亲自打电话安排的，要保证他们几个老教授用车。

校文革这一段，我们没有指示任何人去批斗任何一个干部、教授、教员及学生，没有逼死人。但是，由于党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将我们贴在校内的大字报公布于世，亲自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校文革无法控制群众的狂热情绪，当时任何一个单位的领导也无法控制局面。在失控的情况下，发生群众乱批乱斗，以至自杀事件，作为下层领导单位是无法承担责任的。这是令人深感痛惜的事。尤其是在北大发生“六一八事件”后，工作组把它定为反革命事件，江青来北大为它平反，称“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这就更加助长了群众的狂热情绪。北大英语系俞大纲教授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被批斗后服毒自杀，抢救无效死亡。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遭受学生批斗，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服毒自杀，这些事件令人痛心。

不过，这些情况与工、军宣队进校以后继续发生自杀事件的情况根本不同。1968年8月19日工、军宣队进校以后，他们是在北京市革委会及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是在对校内形势完全可以控制的情况下，而且是在他们亲自组织批斗的情况下，造成了多起自杀事件，翦伯赞夫妇就是在这时自杀的。我去参加“九大”前，周总理和江青找我去谈话，孙蓬一等同志跟我讲，你去见总理，你可别光说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说说北大的情况，已经逼死了二十四个人了。我跟总理讲北大当时的情况，总理说别着急，很快会派人去的。可是，还是迟群、谢静宜在北大，还是他们在领导学校的工、军宣队啊！

.....

◇ 杨勋和杨炳章的遭遇

杨勋是北大经济系的青年教师，她弟弟杨炳章在北大旁听的事，是我给解决的。文革初期，她们姐弟俩曾经给党中央毛主席上书，建议江青不要出来工作，得罪了江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间，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反对中央文革的思潮，北大“虎山行”贴了炮轰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杨炳章因发表了支持“虎山行”的言论，被指责为是“反中央文革”。不久，杨炳章被抓起来，反对我和支持我的两派都对杨炳章进行了批判。

一九六六年底的一天，康生指示我，要让学生把杨勋扭送到公安部去。过了一两天，他要我到 he 那里去，而且必须很快就到。我到了钓鱼台康生住处以后，康生说：“上次催你让群众把杨勋扭送到公安部，你办了没有？”我说：“办了，我叫学生把杨勋扭送到公安部，已经送到了。”于是，康生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报告总理：“杨勋已经被抓了。”周总理说：“那么查一下吧。”然后，康生打电话给谢富治，问公安部有没有收到北大扭送来的杨勋。谢富治说：“收到了。”康生又打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同时还说了另外一个人。由此可见，抓杨勋是总理指示的，不是康生指示的。外边都以为是康生叫我抓杨勋的，以为杨勋被抓是因为她在北大反对我，并且就此指责我在北大“镇压真正的革命造反派”。逮捕我的时候，就让杨勋站在台上揭发批判我，抓杨勋成为我的一条罪状。但是，在许多场合，我都没有对此事进行过分辩，没有讲此事是周总理的指示，宁可受到许多冤屈，也没有说出实情。关于抓杨勋这件事，新校长周林进校后我曾向他写信说过，但他置之不理。在北京市公安局逮捕我的大会上，还作为一条罪状叫杨勋控诉我。在市公安局第七处监狱预审的时候，才让我讲清楚并调查证明了我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抓杨勋的。

现在许多人写文章，说杨勋姐弟在那时就看出江青如何如何，大多不可靠也不可信。但他们建议毛主席不要让江青出来工作，确是有据可查的。他们的见识和胆略让人钦佩。

.....

◇ 12月黑风

1966年11月15日，北京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贴出了致林彪的公开信，对林彪的几次讲话提出批评，引起很大反响。随后，不少地方先后贴出了炮轰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北大虎山行战斗团（简称虎山行）于12月10日贴出《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称：

目前在许多单位展开的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辩论，绝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之关键！

除此之外，北大还有“毛林陈之兵”的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从炮轰中央文革谈起》等。

对于这些批评林彪和炮轰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中央文革认为是一种黑风（时称“12月黑风”），号召全市的造反派给予反击。对于中央文革的号召，无论是拥护校文革还是反对校文革的群众组织，都是积极响应的，全校几乎是一边倒地“虎山行”等进行了批判。

▲ 《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北大虎山行战斗团的大字报

近几天来，一向平静的北大突然大动起来了，大号的标语到处皆是，又开大会又开小会又发表声明又喊呼吁，好一派“繁华”景象，就连一向沉默的北大文革常委也活跃起来，首当其冲地于十二月七日深夜十时许，出人意外地在《擦亮眼睛，投入战斗》的乐曲声中，广播了一个《紧急呼吁》，接着北京大学红卫兵更出人意外地号召于11：15去五四操场集合，准备游行，接着又于十二月八日，开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大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行动起来，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北京大学文革常委会的呼吁中说：“最近在北京，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刮起了一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护和翻案的妖风，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指向坚持和毛主席站在一边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于是乎，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北京大学红卫兵，东风兵团，红旗兵团，北京公社等等战斗团体争先恐后的大施恐吓战术，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呀，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呀，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呀，什么《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小组》呀，等等，好不吓人！而吓人最甚者，骂声最狠且最高的要数井冈山红卫兵及其所属战斗团，导演这出吓人战术最积极最卖力的也是井冈山红卫兵及其所属战斗团。

难道形势果真如此严重吗？难道真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吗？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你相信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威信吗？你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人民中的威望，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吗？你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的吗？

那么，目前在许多单位展开的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辩论，就绝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之关键！目前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主流是健康的，好得很！每一个确定革命观点的人，每一个仔细分析现

存形势及几个月来文化革命发展规律，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应该跟着人瞎说，胡乱指责当前的运动，而是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斗争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并站在他们的前头，引导他们，使他们获得结果，获得胜利！

革命的同志们，都不可忘记张承先对“六·一八”形势估计的教训！

然而，北大众炮如一地认为当前炮轰中央文革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他们抓住大辩论中的一些皮毛小事在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把这场严肃的关系文化大革命能否深入发展的争论归结到几个人身上……如此等等。

他们说，这次提倡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多是“保”工作组的，这不是反扑是什么？革命的辩证法是无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随时检验每个人，而每一个组织也都在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潮流之中。过去，井冈山曾代表着革命势力，炮轰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校文革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不是已滑到相反的方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充当围剿这次大辩论的急先锋了吗？而过去那些所谓“保”字号同志，由于少数派夺权后反过来受到压迫发现了问题起来造反，代表革命势力，不也是很可理解的，怎能说成是“反扑”？

文化革命中两种思潮、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一直在进行着，并将继续进行下去。十六条指出“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怎能说人家对中央文革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呢？那末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林彪同志说：“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革命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

如果说，当前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话，那末，这种反扑，在北大就更明显，北大文革常委的莫名其妙的紧急呼吁，北京大学红卫兵组织的示威游行，几个组织联合召开的声讨誓师大会，以及井冈山的“砸狗头”“混蛋”的叫骂声和“上海市的保皇派滚蛋”的岂有此理的大标语，不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什么？你们不相信群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运动不明真相、毫无思想准备的群众，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什么？令人遗憾的是，以反对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挨骂最多的井冈山红卫兵及所属战斗团也极尽挑动群众斗群众之能事，变本加厉地执行从三司批发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的确是发人深思的，每个革命者应从中吸取教训。

北大必须大乱！然而几天来，北大一直是一边倒！难道大家的意见果真如此统一吗？我们应该彻底解放思想，真正发扬林彪同志所指出的大民主，敢想敢说，不要怕大风大浪。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里发展起来的，还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不敢直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吗？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趋群众运动之势，为了文化大革命更深入地开展起来，我们就要炮轰中央文革小组！

愿中央文革小组开门整风，深入群众，听取批评意见，愿全国人民对几个月的运动来个大检查、大总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雨过天晴，望东方已见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

同志：举起你的双手吧！

《虎山行》战斗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虎山行”的大字报向我们展现了当时运动的一个侧面。他们希望中央文革开门整风，认为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现在看来，他们真是太天真了。自从在“民主”的前面加上定语“毛主席的”，其实就只有一家之言了。

□ 摘自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2017 年出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